

合在一起，二者是阴阳共生、共存关系，双方非常奇妙地存在于对立、互融的“势”中，既保持了相互独立，而在事实上已经融为一体。天下的虚位给各族群以平等入主的机会，不同的族群不断加入，在这个兼容的平台上，有一种内在的向心力把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天下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挑战习以为常的形式逻辑，也不是故弄文字的狡狴，我们努力传达一种几乎不能传达的关于天下的完整的经验。多元与一体并存不碍，“千灯共照，各不相碍”的华严境界就是天下的传神比喻。

现代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族群状况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杜赞奇），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包含了许多象天下这样既在历史的记忆中，也在现实的延续中的中国经验，正是这些经验历史地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我们一致受惠于这种经验，根据文明发展的“可接近性”原理，这种经验最大程度结合、支持了不同族群的持续接近、交融和竞争，这种差异性的接近是技术和思想进步的重要契机¹。在这种视角下关照隋唐统一帝国崩溃以后的一千年，辽、宋、夏、金、蒙古的对峙的分裂时代其实是一个卷入土地、民族更广阔的亚洲的大战国时代，元朝统一了这个战国，但在还未能成功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就灭亡了（肖启庆），明与北元是另外一个南、北朝（许倬云），清把这个南北朝重新结合为统一帝国。也有学者表述为这是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姚大力）。拉铁摩尔也注意到游牧方式对中国历史循环的影响。夷夏互动之势，一直是中国形成的原动力，元与清就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超出二元互动的大势，我们关注天下的夷狄之维，但不认为有所谓“超越中国的帝国”（罗友枝）²，西方学者可能没有体会到前揭华夷间如阴、阳的那种那种进退互融的“势”，如果没有广阔的历史视界，把二者看成截然对立的，就可能得出“征服王朝”、“超中国”这类结论。

【论 文】

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

黄达远³

（、博导）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⁴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缺乏基本的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

¹（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7-59页。

² 杜赞奇：《不平衡发展与多民族国家：二十世纪的中国与现代世界》，2010-10-10，四川大学演讲；许倬云：《作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年；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故事》，<http://www.lsjyshi.cn/>；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1-551；Eveyn S.Rawski（罗友枝）：《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³ 作者为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教授

⁴（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378页。

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学”¹。

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²，天山就是内地与“绝域”的一道地理分界线。道光年间思想家魏源记述道，“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³天山作为天然地理分界线的作用被恰如其分表达，一是天山作为内地与新疆天然分界，二是天山作为内部“南回北准”——南北的分界线。天山南部和北部各有一个地理政区名词来表达：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乾隆时官修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北路”⁴。嘉庆年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记述⁵，徐松撰写《新疆赋》，分别由《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⁶组成，实际上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洪亮吉将流放见闻撰写为《天山客话》⁷，有时天山就作为新疆的代名词。

天山在我国的先秦文献就有记载。在《山海经》中已经有“敦薨之水”（塔里木河）、“敦薨之山”（天山）的记载。另一部先秦时期的著作《穆天子传》则有周穆王到天池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汉代关于西域的地理空间进一步清晰化，《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⁸尽管中原的文献对天山早有认知，但是天山作为西王母的居地，成为“西域”的一个文化象征，清代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写下《天山歌》，“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⁹清末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在《哈密道中》写道，“汉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样圆。立马天山看北斗，故乡回首独凄然。”¹⁰在时人的观念中，地脉、天涯、明月、胡天、北斗、青松等，“天山”作为“绝域”的意象跃然纸上。

天山的重要性随着时局的改变而日益引起瞩目。中国为确保陆疆的安全，重视经营新疆。俄国、英国、中国围绕各自的利益在中亚与新疆展开了号称为“大博弈”¹¹的地缘政治竞争。尽管中国一度面临“塞防”与“海防”的两难之境，但依然以塞防为重，左宗棠出师新疆，剿灭了一度窃据新疆的阿古柏势力，保全了大片国土，也在“大博弈”中保持了平衡。这种平衡维持了近30年后被再次打破，俄国、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局势处于半失控的状态，制造了新一轮的中国内陆边疆危机。外蒙古在俄国的蛊惑下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出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一直与苏联在东北亚竞争的崛起日本也不甘落后，势力深入中国东北、蒙古等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与苏联的对抗之势。

此时日本学术界“不失时机”的提出了“亚洲史”、“东亚史”的史学观念，淡化“中国史”

¹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

² 天山山脉全长2500公里，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中国境内为1700公里，西起乌恰县克孜河谷，东至哈密星星峡，南北宽100—400公里，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山势东高西低，多冰川。最高峰为托木尔峰，海拔7435米，在阿克苏地区境内。

³ (清)魏源：《圣武记》卷四。

⁴ (清)傅恒等修：《钦定西域皇輿图志》，乾隆武英殿刻本。

⁵ (清)松筠修：《西陲总统事略》，中国书店影印本，2010年。

⁶ (清)徐松撰，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

⁷ 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262页。

⁸ 《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

⁹ 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¹⁰ 转引自李彩云：《论清代西域诗中的天山意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¹¹ 指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英文为“The Great Game”，俄文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

的意图明显，¹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² 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³ 将中国历史表述为“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天山与长城作为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其政治意义陡然上升。

这一时期有两位国际学者对天山的研究值得重视，一位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⁴ 另一位是日本学者松田寿男。⁵ 松田氏的研究继承了日本“亚洲史”的传统，他将亚洲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湿润亚洲”，包含有狭义的中国和印度等；二是北亚的“森林亚洲”；三是中亚的“干燥亚洲”。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拉铁摩尔则秉承美国“门户开发”的政策传统，提出“华夷共治”的观点。从学术研究看，与松田氏“历史地理”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区别的是，拉铁摩尔在研究中开辟了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倾向的道路。他的眼光也更为明确，从“区域”的比较中发现“新疆”的特殊性。“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⁶ 拉铁摩尔与松田寿男构建了一个新的“亚洲史”为背景的天山历史叙事，完全不同于中国王朝史的叙事框架。不过，他们对新疆史的影响却并不大。

真正对新疆历史叙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来自于俄罗斯帝国以及继承者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1857年，俄罗斯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数量（55%）就已经超过俄罗斯人，随着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发展，为民族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潜在的条件。1905年，俄国已经产生了民族政党。1917年10月，俄罗斯共有206个民族党。⁷ 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鞑靼人加斯普林斯基发起了一场“扎吉德”运动，从语音方法、课程内容和设置、教材选取和编写等方面对伊斯兰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该运动很快就传入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中当中，民族主义的知识开始进入新疆。1921年，在苏联塔什干的会议上确定了维吾尔的名称。⁸ 1934年，盛世才督新时期效仿苏联民族识别政策，将新疆境内的民众划分为汉、维吾尔、塔兰奇、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归化等十四个民族。当时甚至还出现了要按照“突厥民族”进行民族自决，建立“东突厥斯坦”的舆论，顾颉刚先生立即予以回应。⁹ 他以柏林民族博物院在新疆出土考古文献中整理出二十四种文字、十七种语言为例，证明新疆诸民族的形成都是在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都不能称为新疆的“土著”，

¹ 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9—14页。

²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³ (法)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0页。

⁴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 是美国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曾周游新疆、内蒙和东北各地，三十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还曾访问过延安，1941年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后任职于战时情报局，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五十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亚洲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亚洲》等诸多著作。

⁵ 松田寿男(1903—1982) 中国古代中西交流史及历史地理学家。1953年以《魏晋史书中所记载的天山各国的论证》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干燥亚洲文化史论》《东西亚洲的楔子》《中央亚细亚史》《亚细亚史论》《中国》《东西文化的交流》《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等。

⁶ (美)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⁷ (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⁸ (美) 约瑟夫·F·弗莱彻著：《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收入(美)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⁹ 顾颉刚：《新疆的种族》，载《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14页。

真正意义的土著只有塔吉克人，特别是他指出以语言定族群的错误：“夫新疆之地本无突厥遗黎，惟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诸族操突厥语耳，犹操英语者不必为英国人也。……‘斯坦’一词本波斯语，随人步趋而忘其国族传统。”¹

到1949年，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还有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约百年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与晚晴民国时期不同的是，新疆以“民族区域自治”代替了此前的行省一级的政区制度，民族史、政区史成为新疆历史的标准书写范式。对此，汪晖已有反思，“以民族为单位书写历史，意味着将区域的扩展置于纵向的差异性时间的轴线上，而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书写历史，则通过空间的规划将纵向的差异性时间置于统一的时间框架之下。前者以民族认同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通过对抗统整性的叙述，重构另一层次的统整性逻辑；而后者将区域关系整合到全局关系之中，虽然不否认区域的内部差异性，但力图按照行政区划将这些关系的有机性置入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之中。”²民族史和政区史很大程度上掩蔽了新疆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流动性和独特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的区域体系、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新说、李济关于中国民族的形成等知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已经得到公认。1989年，费孝通先生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对中国的民族特色发展道路的一种反思。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提供了对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对新疆与中原、草原的关系的新证据。20世纪初，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考察新疆北部边疆城市伊宁的商业状况时，看到汉、满、回、维、锡伯、索伦、额鲁特、蒙古、哈萨克、俄国喀山州的伊斯兰教徒、柯尔克孜、安集延、塔什干、浩罕、犹太、俄罗斯人等民族的在聚集交易买卖的场景时，发出“实乃天下一大奇观”的感叹。³而他在考察南疆喀什回城时，他不仅看到回城的商业繁荣，为全省第一，更注意到“俄属突厥人、阿富汗、克什米尔人等，身着各种服装，在市场上往来奔走，那情形宛如参观东西人种博览会。”⁴1968年，美国著名的中亚史学者弗莱彻就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喀什噶尔人和维吾尔斯坦的居民同属一个民族的观点——更不用说他们都是维吾尔人的看法了——主要出自20世纪民族主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⁵在中国，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末，清朝的知识界就发展出一套“西北史地学”，虽然还是遵循“王朝史观”，但是注重将西域地方化、本土化的知识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对于西域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等记载颇为详尽。不过这一传统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被中断了，而被“边政学”取代。

近年来，随着张广达先生关于西域是一个文明的“陆上地中海”观点被广泛认可，区域研究的视角再次受到重视。通过区域研究有助于揭示新疆历史的多样性，帮助重新认识新疆历史与中原历史、草原历史的相关性以及新疆的本土化特点。围绕着“陆上地中海”这一区域研究的走向，天山必然重回到新疆历史叙述的中心：“无论是当今还是历史时期政治区、经济区、文化区等人文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异，无不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因果关系。”⁶

从新疆的沙漠、绿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空间，形成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脉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带将这些地理空间联系起来，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就是这幅历史画轴的“轴心”，松田寿男形象的把天山山脉比喻为“半岛”，“长长地浮现在沙海上的所谓‘天山半岛’，在其南北两岸把很多的绿洲象珠子或肉串似地串连起来。这些绿

¹ 顾颉刚：《新疆的种族》，载《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14—218页。

²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三联书店，2011年，第188页。

³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日野强伊犁纪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⁴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日野强伊犁纪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⁵ (美)约瑟夫·F·弗莱彻著：《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收入(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⁶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洲实在可以看作是设在‘天山半岛’岸边的停泊场，看一看历史，可以说确实如此。”¹ 绿洲是“停泊场”和“港口”，绿洲之间的道路是“航路”，驼队是“沙漠之舟”，天山是“半岛”，一幅“陆上地中海”的商业交通景象已经被勾勒出来。清代天山沿线的城镇，常被称为“旱码头”，骆驼被称为“旱龙”。不过，“陆上地中海”的繁荣主要是来自于蒙古草地上归化到天山腹地的古城商路的开辟。“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²从归化城通往新疆的商路也有三条：北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古城；中路由武川、白灵庙西行，经阿拉善、额济纳草原至古城，再西行至乌鲁木齐；南路经包头、宁夏、兰州、凉州等地达古城。

十八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新疆区域中心市场是距离迪化以北约 500 里地的古城，而不是首府迪化。“（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出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³当时民谚云：“想挣白银子，走趟古城子。”古城商业繁荣程度超过行政中心城市惠远与迪化，“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⁴行政中心与商业中心出现了分离的趋势。新疆形成了一个古城为中心的全区商业网络，自古城分道，循天山而北，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⁵市场上流通的物资有粮食、茶叶、毛畜产品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等。绥来县（玛纳斯）因紧靠奇台，商业繁荣，有“金奇台，银绥来”之称。

古城的繁荣来自于“长城一天山”商路沟通了东西之间的商货贸易，这条商路的开通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拉铁摩尔敏锐的发现，“长城一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一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七世纪，长城一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⁶从道路中可以看到沿线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拉铁摩尔进一步提出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在道路形成中的作用不同，游牧者迁徙的牧道是社会原动力，还发展不成真正意义的道路，只有成为财货的流动之路、贸易朝贡之路、绿洲与草原的交流道路，这几种力量关联交织而塑造的道路，才是“真路”。⁷“历史原动力”在商路的形成中具有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的来源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的关系中来看。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⁸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⁹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样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长城内是农区、外是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是沙漠绿洲，外则是草原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组

¹（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²（民国）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二《新疆实业志·商务》。

³（清）方士淦：《东归日记》，收入杨建新：《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3页。

⁴（民国）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二《新疆实业志·商务》。

⁵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文史哲》，2009年第4期。关于清代新疆市场体系还可参见黄达远：《清代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⁶（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⁷（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⁸（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3页。

⁹（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

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清朝再次击败控制天山的准噶尔游牧势力，打通了长城—天山沿线两侧的道路，使得农业地带、草原地带、绿洲的力量在“过渡地带”得到平衡，促使东西交通路线再次恢复。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族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¹因此，天山也成为连接南北的“过渡地带”，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族与绿洲居民之间“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前者主要联络草原绿洲为“草原之路”，后者主要是联络沙漠绿洲为“绿洲之路”。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在天山腹地的古城交汇，并通过它与长城的交通线相汇，从而形成了一个“陆上地中海”的纵横交织的交通网络。

天山不仅南北气候迥异，而且山上、山下具有显著的地理与气候落差，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文化空间，山上的山居民和山下的绿洲民之间以金属、牲畜交换山下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形成商业市场。各个绿洲的特色不一，每一个绿洲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清代乾隆年间，纪晓岚吟咏新疆的特产说，“西域之果，葡萄莫盛于吐鲁番，瓜莫盛于哈密”。²在19世纪末成书的穆斯林史料《依米德史》中对天山南路的“七城”特点都有记载，和田绿洲，“这里盛产绸缎，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和各种宝石。这个城市足以使一个庞大的商贾开销掉自己所有的钱财。和田的手工艺品不是那一流的商家靠金钱可以买得了的。这里的土地较其人口小而瘦，粮食不能自足。但盛产各种果实乃至剩余。”阿克苏绿洲，“这里少见手艺人，大部分是庄稼人。阿克苏有着丰富的粮食和水果。还有多而美的大米。这些大米往往被运往其它城市出售。”吐鲁番绿洲，“这里还有驰名各地的葡萄，白如雪朵的棉花。”³穆斯林史料不仅可印证汉文史料，同时对地方的记载较汉文史料则更为清晰具体。

如果将“长城—天山”主路视为“主航道”，如水系的“干流”；而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是两条主要“支路”，如水系的“支流”；而更次一级的道路，则为更低一级的“支流”。依次类分，不同“干流”与“支流”的汇合处形成各种地方层级的市场。如商路东端的百灵庙、商路西端镇西（巴里坤）都是曾经的地方中心市场，以商路的各级中心形成的市场体系是一种与农业地带具有明显差异的区域体系，不仅对施坚雅提出的农业区市场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可提供一个观察新疆区域史的新视角。以商路市场层级为中心，可以分别识别出不同的区域：“天山—长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天山侧面（山居民与绿洲民）、草原绿洲、沙漠绿洲、河流、山脉等⁴，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区域史。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⁵但是，通过天山这一历史“主轴”或许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和人勾勒成一幅更为完整的画卷。通过区域史有助于恢复以往在新疆历史书写中被忽略的事件，如在长城—天山的道路以及在道路上奔走的骆驼客，过去他们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但在拉铁摩尔

¹（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²（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³（清）毛拉穆萨：《依米德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译本。

⁴ 参见黄达远：《在商路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探析》（未刊稿）。

⁵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看来，这些“非汉非胡”的“过渡地带”人群，却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主体始终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在历史认识中的地域概念，不只是历史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限”，¹许倬云指出，中国近代史的过程，“迂回曲折，若从‘我者’与‘他者’的调换，将中国原有的文化，化‘他’（西方文化——作者注）为‘我’，弃‘我’为‘他’，在中国历史上毋宁是仅见的深远变化。”²基于对民族主义知识的反思，必须还要化“我”为“他”的眼光，以历史的“我”看历史的“他”，这样才能重新观察和解读以天山为背景的各种事件，从其中的“变”与“不变”，体会新疆历史的复杂性、生动性和模糊性，重新理解新疆及其历史演变。

【评 刊】

从中华民族“民族构建”和凝聚力变化的视角 来检验中国民族政策的社会实践³

——评关凯的“国家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问题”一文

马 戎

《文化纵横》最近刊发了关凯的“国家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问题”，这篇文章梳理了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民族话语”和民族政策的沿革，提出了几个可以引人深思的问题。

要讨论“民族话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民族”这个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在民国初期曾强调“五族共和”，但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五色旗随即变成青天白日旗。特别是1931-1945年抗战期间，占据学术界和政界的主流观点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语），民间的最强音是“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个时期的“民族构建”的单元是中华民族，“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把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在当时各族精英和民众中，这是最顺应全国人心也最能凝聚人心的目标。

共产党夺得了全国政权后，中国的“民族话语”发生了变化，识别出56个“民族”，并在政府行政体系中划分出一个“少数民族事务”系统。于是，中国的“民族构建”出现了两个层面（中华民族、56个“民族”）。但是尽管在人们的政治认同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但是中央政府仍然一度成功地强化了全国民众和各族精英的凝聚力。此时，政治凝聚力的核心不再是“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是内部的“阶级斗争”，用关凯的话语来说，就是“解放”（消除人身与经济压迫）和“进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描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是没有财产和生产资料、生活困难的穷人，共产党领导在各民族居住区推行“土地改革”，“推翻三座大山”，把地主、巴依、领主、王爷占有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农民，在藏区解放农奴，这些举措无疑赢得各族大多数民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也使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赢得了至少一代人的“土

¹ 参见刘志伟：《区域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² 许倬云著：《我者与他者》，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页。

³ 这篇评议刊载在《文化纵横》2013年8月号，第126-127页。